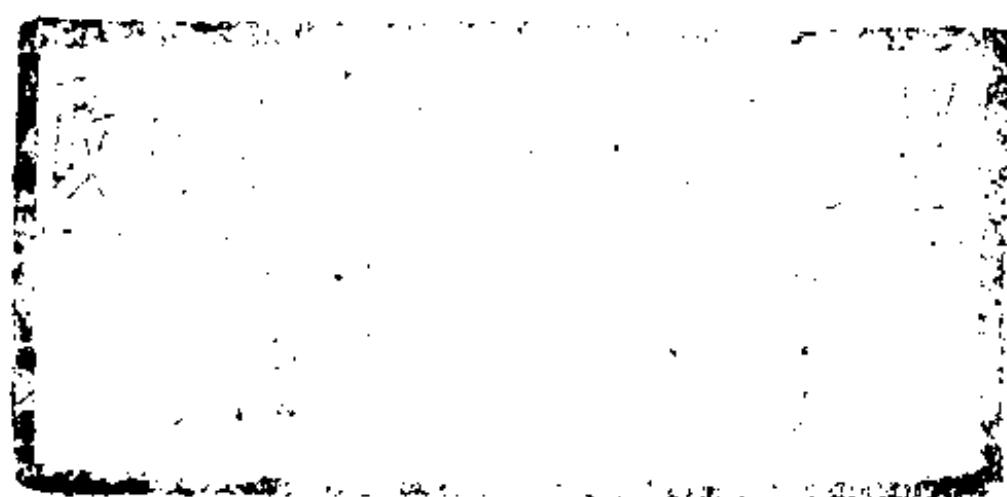


JH/c/39

惠安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惠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

目 录

萧厝港海运商业简史	萧如元 (1)
崇武镇对台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陈国江 (2)
建国前崇武渔业概况和鱼牙行盛衰	何云瑜 魏锡廷 (6)
国际航标崇武灯塔沿革	何云瑜 (12)
从地方志的角度略谈惠安崇武与台湾的关系	蔡永哲 (13)
獭窟岛的渔业和海运商业	张炳南提供资料 庄澄甫整理 (19)
獭窟石斑鱼	张炳南 (24)
抗战时期的“小上海”——峰尾刘玉春、刘小鼻、刘华玉、刘荣明、刘顺金等口述 刘为直整理	(26)
峰尾商人开设“票仔局”概况刘乌九、刘小鼻、刘玉春、刘瑛甫口述 刘为直整理	(28)
赤湖造林治风沙	许高明 (29)
惠安县首次用飞机防治松毛虫、木毒蛾	陈伙金 (31)
惠安畚族简介	陈国华 (36)
解放初惠安教会概况	郑金洪 (40)
黄长水先生生平简介	惠安县工商联 (44)
李述中先生传略	李述仁 (46)
著名劳动模范洪乐	郭家齐 (49)
名医涂去病	涂钟馨 (54)

惠安小学教育概况.....郑金洪（56）

解放后惠安县卫生事业费支出情况.....林美玲（60）

抗美援朝期间惠安的防细菌战工作.....吴 定（63）

惠安县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的整理工作.....王显谟（65）

惠安先农庙的演变及其影响.....王焕章 王淑基（67）

城山遗迹见闻——兼记弘一大师瑞集岩之行.....许焜元（71）

惠北风俗采摭.....刘为直 刘华基整理（72）

业余京班“丽泽票房”始末.....陈纪章（74）

陈国辉在惠安.....庄德祖（78）

附：《惠安文史资料》第五辑勘误

萧厝港海运商业简史

萧 如 元

萧厝港，港深山高，潮水急，不淤浅，既有利于避风，更方便于船舶停靠，具有多种良好条件，乃于清朝光绪年间，海运商业曾大繁盛。当时由台湾进口者，大都是大米、苧麻、布匹、白糖、煤油、海产等，出口台湾者，大都是织成苧布；由大连、烟台（诸地称大北）进口者，大都是豆饼、黄豆、山东粉、北生油等，出口大连、烟台者，大都是桂元干、糖类等。除和台湾与大北较大宗经营外，同江苏上海，浙江宁波、温州，福建福州、厦门、泉州，广东汕头，贸易也不少。至于进口货物销售地点，大都是晋江、南安、惠安、莆田、仙游各地。最繁盛时期，萧厝拥有人口七千多人，置有大木帆船（百吨以上，百吨以下者不计在内）六十九艘，大行户（资本万元以上者）有大成、鼎成、信成、建成、益成、泉成、东成、锦成、万成、宝成、振成、财源、茂源等十三户。这十三户除自置大木帆船、开张行户外，还各另设“典当”（因当时没有银行，以利借贷）。中产者（资本万元以下者）有七十二行商。一般者（资本千元以下，附带随船做生理的）不计其数。是乃有“十三万”、“七十二千”、“不计百”乡之绰号。若按当时每一龙银可购百斤大米计，不可不谓巨富矣。其中以萧继光（大成）和萧阿富（万成）更为突出。如继光对公益事业是很重视的，他自家独办一所“清远小学”（那时是最先进的）外，另铺架不少桥梁（如施厝桥）和修理道路，故他俩有“萧百万”之称。后因清政腐败，列强侵蚀，海盗猖獗，商贾尽受磨折，市场逐渐衰落。

直至民国二十四年保甲建立后，地方比较安定，除萧槌吓（建成号）、萧锦仔（合春号）、萧赤毛（东成号）、萧茂卿（泰和号）和萧碧川（振成号，他还另营益记轮船代理行）等原有五行号外，又有久大行、建利、合记、天元、裕

成、东达、振协顺等行户，诸行群立，大营台湾和大北生理。曾记得，仅一夜之间，萧槌吓一商户则有两艘大乌糟船（均二百吨以上）和五艘千担以上的电船，来萧厝卸货，日夜搬运不停，故有“不夜市”之称。是乃引起当时政府注意，马上来萧厝设立“海关”（负责人山东省姓林的）、“直接税”（负责人谢秘书，福州人）、“查缉所”（负责人平潭郑成廉）等三个机构。后因日本不断侵华，中日矛盾越来越大，抵制日货越来越严厉，各行商无法施展营业，乃逐渐停歇。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沿海被日本侵略军封锁，船艘无法畅行，久停港澳之内，任凭风吹日晒而破坏，触目伤心；村民生活遭严重威胁，迁居就农者不少，人口一度曾锐减至二千多人。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崇武镇对台贸易的历史和现状

惠安县工商联 陈国江 搜集整理

（一）

崇武镇是闽南金三角北翼的滨海重镇，地处惠安县城东南部，介于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三面环海，一面连山，形成半岛，突出于台湾海峡，隔一衣带水与台湾相望，距台湾省中部的港口约97浬。全镇面积19.5平方公里，辖区共有12个村。海岸线曲折，全长28.8公里，有六处可以停泊船只和避风的港湾。据1985年统计人口数字，有12299户，59045人。地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有丰富的水产资源和潮力能源，还有花岗岩石、贝壳、玻璃沙和腐殖酸原料煤泥土等物资。由于每年平均风力在7—8级的有100多天，受风沙的影响，土地贫瘠，可耕率低，而且只能种植番薯、花生、大小麦之类的农作物，大量的生活、生产资料需求于外，由是，人们都面向海洋和利用浩瀚海洋四通八达

的有利条件，寻求生计，故职业结构以渔为主，渔业人口占69.1%，航商次之。渔船除捕鱼外，还贩运鱼货和利用渔闲季节与航商船一样天南地北地运输货物和经商贸易，以渔兼商。据有文字记载，明嘉靖年间，“有不渔耕者，挟资鬻货，西卖荆襄，北走燕赵，或水行广之高琼、浙之温台等郡，装载茹榔、米谷、芋麻杂物。富商巨贾几遍崇中”。被誉为“三绝”的明时螺阳布衣黄吾野诗人（1524—1590）就有“津临晋水终朝路，海接东南一夜水，击楫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之句，描述当时渔、商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可见崇武在明朝期间就与台湾有频繁的贸易活动。

（二）

据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崇武大岞渔民张虎、蒋大竹是郑的有名舵手。清光绪甲午战争，台湾虽然被日本占领，但崇武的捕鱼、通商仍然与台湾保持来往。进入二十世纪，大岞渔船往厦门捕鱼，经常与在厦门的台湾商人（鱼牙行）接触，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介绍和保证，渔民张城、张小抛、张花令、张三元、蒋金木、张荣生、张臭来、张九、张金顺等带领钓槽船（大渔船）十余条、船员300余人到台湾澎湖一带海域捕鱼，同时取得日本驻台湾当局的许可，流往基隆、鹿港、马公等地。从此，每年春夏两季，一年一度结队前往，不失渔汛。渔民到了台湾，备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每当端午节后，渔民要回家，台湾人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站立码头，唱着送别歌曲，歌声婉转，扣人心弦。

据统计，仅大岞村从1921年至1936年，十五年间，前往台湾捕鱼和经商的渔船就有18艘，占全村大型渔船十分之七；渔民500余人，占全村劳力十分之五。当时有一首童稚都会念的歌谣：“鸡笼打狗（群众称基隆为鸡笼，称高雄为打狗），自家门口，要吃要穿，随时可搞，有情有义，亲人多好。”由于海峡两岸人民的长期亲密往来，招来日本侵略者的妒忌，1924年3月日本驻台当局悍然对渔民下书面通知：

一、不准在台湾人家里作客或留宿；

二、不准私留鱼货转售；

三、不准上日本馆子（妓女间）；

四、不准和台湾人集会或招聘台工；

五、要买日货和日本烟、酒。

日本统治者限制越严，两岸人民的来往越亲，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越深，经常发生反抗事件，因而渔民受到殴辱、罚款，甚至被抓坐牢。但多数都在台湾人民的掩庇和多方奔走下而告平息。有时也连累台商（保家户）被限令短期停业的处罚。

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两岸当局虽然都采取海禁政策，使正常的海口作业和贸易难以开展，但渔民、商贾还是通过各种官方、民间走私形式进行贸易。崇武南街有家瑞裕商行，是英商洋行代理商，垄断惠东半县的洋油、洋灼、洋火（火柴）。南街还有隆吉、合和、益隆三家商行，专做台湾生意。还有周佛耳、张泉水、黄妈蛭置木帆船，专门航行于崇武与台湾之间。运来的货物有蓬莱米、藤条、机白糖、楠木、桃标火柴、煤油、沙鱼巴、水尖脯、海参、江贝，还有大量日本货；运去台湾的大部份是中药材。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崇武也进行搜日货、烧日货，瑞裕、隆吉、合和、益隆这四家商行才被迫相继停业，但台湾生意并没有因此中断。据1935年9月28日厦门《星光日报》登载9月24日消息：“秀涂海关会同驻军到崇武搜查珍裕号，破获私货（煤油、火柴、糖）甚多。”1935年崇武出版的《海风》月刊第一期载：“十二月廿五日海关舰泊崇澳，捕去走私船一艘，搜出漏税日货多起，张马镇、张文焕、元成等数家损失在不少之数。元月八日又捕去走私船一艘，闻黄老成损失尤多。”同期《海风》又报导：“本月廿八日港墘（崇武辖区的一个村）由台湾载来日货二船……海关会同军警包围，闻所得之货，价值万元云。”

“七七”事变以后，崇武与台湾直接贸易被彻底斩绝，有的商人就利用江浙沿海的温州、洞头、坎门、沈家门、宁波、南通以至山东的青岛等沦陷区港口，设立数十家商行，曲线与台湾通商贸易，大发“国难财”。但也有着他们的惊险和不幸，要闯过风浪、乌军、白军、日本飞机、美国飞机、海盗等六道关，一道关过不了，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家破人亡。走私资敌是奸商不法行为，这里所以引述，是想说明一点，透过它，人们可以了解当时崇武对台通商贸易之一

班。

(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船主刘马进冒着风险，运载当归等中药材和烟酒食杂，从温州直驶台湾，每百斤当归换回黄金三两，还购运大米、糖返回崇武出售，大发其财，打响了胜利后崇武对台直接贸易的第一炮。同时，国民党军为了急于赴台接收，军舰不够运兵，就沿闽、浙一带港口，抓封民船。张端元等船在福州被封运兵往台。至台后，国民党军登陆而去，不管民船死活。当时日本军政财贸人员忙于逃回本岛，把大量物资如糖、大米、樟脑堆放于码头仓库，无人管理，任人掠夺，张端元即乘机装回一载白糖获得厚利。风声一动，崇武大小船只和一些失业者争渡台湾，形成热潮。连过去一向害怕澎湖沟（即台湾海峡）风浪的一百多担的小木船，也作冒险之行。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棺材枋插篾枝子也过台湾。”运去的是中药材、副食品、烟酒、布匹等杂物；购回的是白糖、大米、黄金、高丽参、水果（香蕉、菠萝罐头）等，获利几倍至几十倍。航线若是由福州启航则驶至淡水或基隆，由厦门启航则驶至布袋澳或台南安平港，由崇武启航则驶至台中梧栖港。笔者于1946年2月间随船东渡，因海途遇风避入澎湖列岛的西屿和马公，后转航台南布袋澳。台澎人民长期在日寇残酷统治下，对祖国无限热爱和向往，所以一看到大陆去的人，感到非常亲切，高喊着“祖国来的亲人”，争着请往家中作客，煮菜备酒盛情款待，感人至深。从1945年至1949年上半年，是崇武对台贸易的全盛时期，单大岞村的渔、商船就有25艘，人员达千人以上，穿梭于台、陆之间，或捕鱼或经商。大岞渔民的捕鱼航海技术较为高明，大部份行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商贾都喜欢雇用大岞渔民作舵工或领航，当时有首民歌：“欲与台湾通，大岞好舵工，舵牙把得正，不怕当头风，暮下三屿岙，梧栖太阳红，乡亲多情义，万事可通融，君汝须在意，生意自兴隆。”

(四)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国民党退据台湾，从此海峡两岸人民被人为

阻隔，“三通”断绝。许多崇武人滞留台湾，不能回乡，加上国民党于五十年代为了补充兵员，在海面大量抓捕渔船民，目前在台湾的崇武人数以千计。基隆市窟子庄就有个“大岞新村”，已衍绵三代，人数满千。他们思乡怀土，盼亲人望团圆，有的人辗转来信附诗“故国仍云海，关山雪未消，卅年游子恨，何日买归桡”，以诉衷情。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谈话及九条具体方针后，有不少人绕道日本、菲律宾、香港回乡探亲。继后中央发表一系列对台政策和“一国两制”构想，大大地促进“三通”发展。目前不仅崇武人回大陆探亲 and 进行小量贸易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就是台胞台轮，二、三年来每月都有数艘停泊于崇武港，进行通商贸易。崇武港已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对台开放港，成为福建省对台贸易基地，县、镇都在这里专门设立对台贸易公司。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相信，崇武的对台贸易将会再现繁荣昌盛的时代。

（注：本文有些资料是参阅崇武黄氏族谱，崇武镇志参考资料1、7、10、12期以及采访一些老年人所得。）

一九八七年三月

建国前崇武渔业概况和鱼牙行盛衰

何云瑜 魏锡廷

（一）

崇武为滨海之地，自古以来，居民多以海为田，从事渔、航业，而以渔为主，是福建著名渔港之一。

初时，渔业为浅水坪拖网业，逐渐发展到简单的小船钓业。明末清初，开始出现大型的渔船到深海捕捞大鱼，其中有的是霜降出海，至越年谷雨才回来，前后半年在浙江渔场进行生产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崇武高士黄吾野就有“敲针冬

钩坎门鱼”的诗句。渔船长期使用笨重的篾帆，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全部改用较轻便的受风量大的布帆。在长期渔业生产中，渔民积累了许多作业的方法，如网业有拖网、围罾、网仔、漏尾、楂沼、浮鲚、扫梭子蟹等，钩业有钩槽、大排、放滚等。这些沿革，使所捕鱼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多。生产的鱼货，则由鱼贩直接到海头向渔民购买，运销各地。渔业日趋兴旺。

(二)

随着渔业的兴旺，较富有的渔民自置渔船出海捕捞的日多。但造船和购置渔具需要大笔资金，一般还须多方借款，才能成事。于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出现拥有雄厚资金的殷实之家或富裕的鱼贩商人，在崇武办起鱼牙行。他们贷款帮渔民造船、购置渔具，称为“放行头”。约定他日渔船下海生产的鱼货，交由他们的鱼牙行出售，使他们从中抽利。

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是崇武鱼牙行最兴盛的时期。不但本地人放行头、当行家，崇武西路的苏坑、张坂、埔塘、霞美等村，也都有人携带巨款来崇武放行头、当行家。从顶街数到下街，那时共有和成、新兴、吉兴、吉昌、顺和、顺昌、顺记、瑞晋、和兴、义记、华记、谦益、隆记、成宗、如川、益发、福泰、玉庆、顺吉、雨记、民昌、晋记、天宝、陈温、协德、同丰、通裕、胜元、源山、元升、益晋、合法、如法、清吉等三十多家鱼牙行。

那时，崇武拥有大小渔业生产船只六百余艘。其中有30吨左右的网子船四十余对，13至18吨的楂沼五、六十对，30至60吨的钩槽三十余艘，6至20吨的大排四十余艘，以及5吨以下的围罾、拖网、放滚、竹筏等所谓海子船三百余艘。天气晴和时，大小渔船都可以出海生产，早出晚归，每日总产量一千担左右。每年约可出海两百天，年总产量十五至二十万担。主要产品有黄花鱼、带鱼、鲨鱼、鲳鱼、鳓鱼、马鲛、鳗鱼、鲢鱼、石斑、乌贼、鱿鱼、三角鱼、马面鲀、梭子蟹、虾等。曾有一次，前按村两位渔民驾一竹筏竟有办法捕到一条近四百斤鱼行秤的大鲨鱼（每一斤鱼行秤等于五市斤）。又有一次，大岞村张城航代钩槽船一流水竟捕到一百零四条大鲨鱼。那时，每年清明谷雨季节，在崇武浅水坪海面，满是乌贼（多年来已全无这种情况，是水域受污染或其他原因，值得研究），渔民一经

发现，立即开出小船打捕，每船三人，一日数次，每次可获数十斤至数百斤。渔民所获鱼货，集中到各鱼牙行出售。中街路、南山堆、中路头等地，夜以继日，皆堆鱼腥，拥塞不通。销路则由鱼贩到鱼牙行购买，下路用船运至泉州、石狮、安海、河市、青阳、浦内销售，每日七、八百担；顶路用人力肩挑至惠安、枫亭、仙游、南安、洪濑销售，每日二、三百担。

此外，二、三十年代，崇武每年到浙江渔场捕捞的渔船有八十多艘，舢板三百左右只。其中半数以上的大船是从崇武启航去的，还有三十多艘大船和一百多只舢板是在玉环、坎门就地租用的。到浙江作业的渔民约二千人，年总产约五至六万担，总产值约三十至四十万元。在浙江设有崇武会馆，处理旅浙渔民和当地人民交往中的有关事宜。

(三)

拥有渔船的渔民称为“世头”。有的合股置船，则股份多一点的或者有某种生产经验的股东被推举为“世头”。凡是贷行头款的世头，他向哪一家鱼牙行贷款，其所生产的鱼货，必须全部交给哪一家鱼牙行代售，价格双方洽订。每售百元，鱼牙行向世头抽利七元，另外，又加收鱼贩三元。这样，世头每售百元，实际只收九十三元；鱼贩每购百元，实际成本为一百零三元。鱼牙行在每百元买卖中两方抽利，可得十元，即10%。至于没贷行头款的世头，可以自主选择，将其所生产的鱼货，交给任何一家鱼牙行代售，称为“人事海”。对于人事海，每售百元，鱼牙行向世头抽利四元，又同样加收鱼贩三元，两方共抽利七元，即7%。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鱼货旺产，放行头款多的鱼牙行，每日可赚白银一、二百元；放行头款少的，每日也可赚白银数十元。相当于一至两个渔民全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收入。所以那个时期是崇武鱼牙行攫取巨额利润的黄金时代。

泉州市涂山街也有经销崇武鲜鱼的鱼牙行十几家，鱼贩在泉州鱼牙行售每百元要扣代销费五元，即5%。但鱼贩在崇武买进是赊购的，待泉州销售后才结帐还款，等于无本生意。

在浙江，也有旅浙“栈房”即鱼牙行十家，经销崇武渔船的全部鱼产品。

那时，在鱼牙行，产生一种叫做“行秤”的特殊制度，每一斤鱼行秤等于五

市斤，买卖一百斤，实际是五百斤。据说这是由于渔民想好价，鱼贩想好重，鱼牙行想好卖、好收款的缘故。

鱼牙行同港墘村的世头还洽定，凡捕到大鲨鱼，鱼翅归行家所得；捕到红魷鱼，鱼鳔归行家收益。鱼牙行则送金花、鞭炮、彩礼给世头，供船中谢神、饮酒之用。

鱼牙行与贷行头款的世头双方有以下协约：

1、海上生产，难保永安。有时发生不幸，船被匪劫或破沉于海，世头有能力重整旗鼓的，鱼牙行必须继续向之贷行头款，予以帮助；如果无力而流为一般渔民，则原来的行头款必须长期挂帐，除非其子孙重新振兴，置船生产，否则鱼牙行永无回款之日。

2、世头如果连流丰收，鱼牙行有权逐渐收回行头款，但不得一次扣完。

3、如果世头和鱼牙行感情发生恶化，要另换行家，旧行头款必须还清。

一般渔民出卖劳力，受雇于世头。在出海作业期间，渔民伙食费用先由世头支付。渔民的劳动报酬因作业不同有“人船各半”、“人船四六”、“人船三七”等不同的分配比例。例如网仔作业是“人船三七”，一对网仔十六人，总产值减去鱼牙行的抽利和作业期间的伙食费用后，然后按“三七”开，十六个渔民得30%，船（世头）得70%。十六个渔民又按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定出不同的工分，得高低不同的报酬。那时，一个渔民全年劳动所得，平均为六十至八十元。

世头拥有渔船，又指挥作业生产，比一般渔民收入多。但每年修补渔船、更新渔具，仍是资金不足，需向鱼牙行贷行头款。多数世头只是一种作业的世头，这种作业季节过后，又受雇于人，成为一般渔民。例如槓沼网梅仔鱼和钓鱿鱼的世头，作业季节过后，就把自己的船抛港或者出租，自己受雇于钓白（带鱼）的作业。

（四）

崇武，“五代时（907—960）设渔课。”“明立河泊所榷沿海之利。惠安县东南海地分为八澳，周岁课米九百二十石，闰月加七十七石有奇。崇武一澳大小船网，籍报惠安县征米。民穷力尽，船网破坏，逃亡者多。”“清康熙间（1662

—1722），船有税，网有课；有给由之令，有稽查之役；汛防索其羹顿，镇营窥其澳例。（渔家）隐忍吞声，莫可奈何。”（以上见《崇武所城志》）从以上记载，可见历代崇武渔民均受统治者残酷盘剥，过着贫困不安的生活。

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前期，尽管崇武渔业相当兴旺发达，但渔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境地。

那时，除了鱼牙行的高额抽利，渔民还有种种沉重的经济负担，即地方上的公众事务的开支，如修建神庙，春秋祭圣，谢神做蘸，修理道路，办学等等，都归到渔民身上。由当地有权力的绅士和殷实巨商联系鱼牙行，进行抽分。

还有，西路的土匪，如汪连、汪柴水、杜建、李法等常来崇武。他们写乌单给鱼牙行，向渔民统购鲜鱼。有统购一天、两天甚至三天的。乌单下达，则当天的大小海鱼货，鱼牙行不敢随便出售，鱼价由土匪自订，一般比时价低二、三成。土匪用此非法，一日之内，可攫取白银近万元。

驻军、地方武装也垂涎三尺，苛捐杂税似飞雪而来。如军阀混战时期，崇武设“鱼捐经征处”，按销售金额的1%向鱼牙行收税，每年产鱼十五万担以上，总产值约七十至八十万元，年搜刮鱼捐七、八千元。1928年后办了民团，向鱼贩按担收税，每担二角，每年外销十几万担，收取鱼捐二、三万元。1931年后散了民团，来了陈国辉，鱼货出口一担向鱼贩征收一元，每年榨取十几万元。鱼牙行为了自身的利益，则将鱼价压低出售，以免鱼贩亏本而欠款，结果吃了亏的是渔民。

渔民受到如此层层盘剥，负债的甚至挨饿的十有八九。

（五）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被日寇封锁，渔民无法到外海作业，产量骤然下降，渔业日趋恶化，鱼牙行的利润收入一落千丈。有的渔船转为内港运输，以维生活。往浙渔船虽曾于一九三八年由崇武渔民协会通过外事途径向德国大使馆纳款买旗号，挂起希特勒的“卐”字旗开往舟山群岛继续生产，但在日本飞机、军舰的骚扰恫吓下，根本无法进行作业。特别是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日寇登陆崇武进行大屠杀，所有泊港船只全部被日寇烧毁。从此，崇武渔业元气

大伤，一蹶不振，往浙渔业更是全部破产，直至新中国诞生，都无力恢复生产。渔民流离失所者不知几何。

一九四三年，大战临近结束时期，日寇运输舰只时有被盟国飞机炸沉的，海上经常漂浮橡胶、纱布和军事上重要物资。渔民不时拾获，殷实巨富则以不等价收购转售政府，获利甚多。这时崇武又出现了一个由保长们联合组织的“一元行”，一方面做鱼牙行生意，一方面收购海上拾物。渔民们为了各方面免遭麻烦，生产的鱼货和海上拾物售与一元行的颇多。

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海上比较安定。那时，各地对物资都有不同的欠缺，因此租船搞航商的非常热闹，许多渔船家放弃渔业生产，转向与巨商合股搞航商业。人称那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是大发胜利财。崇武的保长们也各自奔向这条可发大财的道路，一元行就此无形中结束。至于仍然从事渔业的渔民，因抗战时期遭受的惨重创伤远未治愈，这时又因国内解放战争的影响，无法正常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而鱼牙行以前所放行头款，也因国民党币惊人贬值，已不值几文钱。鱼牙行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衰落，至此已奄奄一息。

(六)

新中国成立伊始，崇武渔业仍在半停顿中修修补补，暂时出海生产。不久，人民银行发放大批贷款，大力扶持，政府又引导渔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渔业生产重新起色，再日趋发展。一九五二年，崇武成立渔业服务社、收购站等，开展鱼货购销业务，因此，鱼牙行的业务日淡。至一九五六年，所有鱼牙行的生产资料全部核资入股于崇武公私合营海产商店，其从业人员转为海产商店人员。至此，崇武鱼牙行这一行业也消失了。

(上接12页) 成为现在雄伟高耸、规模可观之建筑物。同时列为世界公布之航标，载入国家海图，采用白色定光，射程15—20浬，高离水面三十三米。可惜者，时至八十年代之今天，仍用汽油灯打气点燃，实为一大缺点。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日

国际航标崇武灯塔沿革

惠安县政协崇武学习组 何云瑜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午后，崇武海面突起台风。是日，崇武、大岞、港墘等地都有渔船在海上捕鱼。台风突来，暴雨骤至，海上一片渺茫，渔船辨不清方向；夜色降临，骇浪滔天，唯有任凭风浪漂撞而听天由命。结果，船沉没，人死亡，财货两空，损失惨重。

过后，乡里漫谈此事，莫不感叹，咸谓若有一灯照明，则其损失当可减轻。

崇武绅士张蔚廷老闻此议论，心有所触，即与数殷实户及鱼行家共商，决定在南城楼边侧建一灯塔，其开支费用由渔民生产中抽分应付。于是南城灯塔就在来年春建成。其时管理人是蔚廷老之族弟抄伯，点燃者雇卢北司担任，用单芯汽油灯。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发生，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交通告绝，煤油断路，灯塔中断使用。后以敌舰时常停泊港面，向城炮击，乡人认为该灯塔目标显明，且又停燃，留着无用，故而暂时拆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主事人士纷纷外出经商，渔民又迫切要求重修。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地方事业一概不管，须乡人自理。

一九四八年秋，崇武东光图书馆负责人张志豪回里，他与汪振德二人，在关心渔民的乡老们倡议下，向各渔航户捐资，负责重建，并在会议中集中意见，将灯塔之址移至城东南隅旧奎桥边侧，以三百担白米之价承包与官住村刘朱司建筑，至一九四九年春完成。当年四月一日正式开灯，由净峰林牧园管理。从此时起，单芯汽油灯改为双芯汽油灯，并正式列为国际航标之一。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由魏秀仁、蒋连钦负责管理（现只蒋一人负责管理）。一九七三年秋，县人民政府拨款重修，扩大、增高、加固，（下转11页）

从地方志的角度

略谈惠安崇武与台湾的关系

蔡永哲

第一、惠台历史上的关系

一、史前文化相同

崇武大岞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石刀、残石器和陶片与台湾大坌坑文化遗址发现的遗物，据考古学家研究属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文化。

二、三国东吴，舰队渡台

东吴以福建为海军基地，建造船舰。

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舰队带甲士万人从闽首次渡台。

《惠安县志》载：孙权大将黄兴偕妻曹氏弃官入闽，居惠邑南凤山。

以上说明三国时期闽台已有关联，惠安颇受注意。

三、隋、唐、宋各代，台湾与大陆相互往来，沿海地区移台人数日多。

四、南宋时，澎台属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

五、元末崇武与澎湖同时设立巡检司，澎湖司管辖澎湖和台湾民政（均属泉州府）。澎台成为我国海防要地。两岸贸易日趋发达，到台人数越多。

六、明代惠安人留迹台湾

惠安人往台，有传说可据者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漳人颜思齐、泉人郑芝龙活动的时期；有文献可考者为明崇祯时期郑成功活动的时候。

翰三先生在《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一文中介绍了十五个惠安人，其中最著名的：

江美鳌，前型人，明永历十八年（1664）为郑武将，官拜龙骧将军。

王忠孝，沙格人，明崇祯元年进士，永历十八年入台，且举家随军，内外亲人数十家同迁。

当时惠安的崇武、小岞、獭窟、峰尾为渡台港口，崇武尤为重要。

郑功成收复台湾，有一路兵马从崇武飞舟扬帆，崇武人入郑军渡台者不少，崇武人魏青任郑军的旗牌官。传说大岞人张虎、蒋大竹为郑军战舰的舵手。

七、清代仕台文武职官

清康熙年间，靖海将军施琅统一国土，开发台湾，崇武人在施军下甚多，其中较著名见之记载的有：刘瑄（功升提督）、曾春（升副总兵）、林瑞（升副总兵）、林连得（副将、攻澎湖时牺牲）、陈元（升左都督）、黄二（升游击）。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王忠孝的侄孙王璋参加福建乡试，中举人第七名，为台湾的第一个举人。这第一个举人就是惠安籍。

康熙年间江美鳌之子江日升（惠安前型人）写的《台湾外记》是一部研究台湾极其重要信史。

乾隆二年，崇武人张勇任澎湖厦门前营守备，十七年升台湾水师副将（这时闽台商船往来频繁）。张勇有德政，台人立生祠奉祀。

至于清中叶后期，惠安人被派往台湾任职的文武官员更多，任过府学、厅学、县学的有曾师洙、曾应选、萧国奇、陈开远、郑重、卫士鳌、骆钟球、庄纫兰、黄廷玉……

由于赴台供职，少者三年五载，多者十年八年，携去家眷，邀来朋友，惠台关系更为密切。

第二、崇武港在地理上的位置

崇武与台北同一纬度（北纬24°—25°）为闽中突出部，闽台通商贸易重要港口。

台湾环岛周长1139公里，海峡宽处不及200公里，狭处仅130公里。

一、崇武与台湾东部主要港口距离

（一）崇武 $\frac{80^\circ}{144\text{哩}}$ → 富贵角（台湾最西北部基隆外港）。

（福州至基隆149哩）